



▲從左到右依次為：陝西歷史博物館藏的馬上封侯銅俑（東漢）；陝西歷史博物館藏的釉陶馬上封侯俑（唐）；中國國家博物館藏的猴騎馬銅飾件（南北朝）。

「馬上封侯」中的猴馬神化溯源

位於江蘇蘇州的吳文化博物館此前攜手海內外諸多博物館，推出「馬——從地中海到江南的千年權力象徵」特展。衆多展品之中有一件「馬上封侯玉飾」頗為巧妙，其將猴子與駿馬組合在一起，整體偏白泛綠，略帶黃斑，造型獨特，寓意深遠。猴子全身匍匐在馬背上，手中提著繞了兩圈的韁繩，姿態輕鬆。白馬四蹄內斂，呈坐臥狀，雕刻技藝精湛能看到馬尾上的鬃毛。兩者身朝前頭往後，似在回應主人的召喚。

蘇州有著強烈的文化底蘊與技術傳承，不僅能在玉器上雕琢出「馬上封侯」圖像，更是將此類吉祥紋飾廣泛應用於金銀器、年畫、鼻煙壺等藝術形式之中，表達了民衆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對事業成功的祈願。

從「猴馬」與「猴馬蜂」組合說起

「馬上封侯」是中國傳統寓意紋樣，由「馬上」和「封侯」兩個部分組成，其中「猴」與「侯」同音雙關。「馬上」則表示立刻、即刻的意思，寓意著功名即將到手。

「馬上封侯」主要存在兩大類表現形式，一為猴馬組合，二為猴馬蜂組合，蓋因「蜂」與「封」同音。因而某些「馬上封侯」圖案中會在馬背上添加上一隻蜜蜂，比如山東臨淄「養馬·娛樂圖」畫像石中，樹下一馬，樹上一猴，猴的身後有一隻蜂，屬於標準的「馬上蜂猴」組合。此外「逢」也音近「封」，「馬上封侯」亦可稱作「馬上逢侯」。漢代壁畫多有車馬出行圖，其中有些馬車前面有猿猴，寓意著「馬上逢侯」，比如武氏祠前石室後壁下部小龕西壁畫像的「出行圖」中，馬車前有一猿猴，高舉雙臂向前爬行。猴馬組合是漢代畫像石中的常客，甚至形成「馬上蜂猴」「馬上逢猴」「馬上封猴」等不同形式的構圖模版。

除了畫像石外，磚雕門樓中也有馬上封侯圖像。比如位於蘇州官太尉橋西側的雙塔影園內有一座磚雕門樓，名曰「雲開春曉」。門樓左側有一幅馬上封侯小圖，畫面中間有一位手持朝笏準備上朝的官員；兩邊的差役，一個手擎高級權貴才能享用的華蓋，一個捧著一隻小猴，意思是馬上可以封侯了，表明官員不僅本人身份尊貴，更能取得爵位，讓佑子孫後代。該圖像與傳統的馬上封侯組合有所區別，或許與當時官員的出行方式有關，如坐轎子則無法展現姿態外貌，騎馬則顯得過於招搖，故徒步前行，以華蓋彰顯身份。

除大型的磚雕畫像外，蘇州小型工藝品同樣鍾愛馬上封侯一類的題材，比如蘇州微雕工藝中的精品「馬上封侯鼻煙壺」。其屬於傳統的猴馬組合造像，畫面底部的駿馬由

白、紅二色勾勒出外形與周身器具，低頭垂尾，似在臣服；馬上方的猴子全身棗紅未摻雜其他顏色，呈現坐姿，卻又與馬背有著一段距離，左手向前伸展，似在抓取身前的蝴蝶。

雖然猴馬組合圖像在民間比較盛行，「馬上封侯」這一詞彙出現得則比較晚，使用頻率也特別低。最早是宋代大文豪黃庭堅詩文中，有一句「原無馬上封侯骨，安用人間使鬼錢」。之後又有一位宋代文人章楨在送別朋友時，用「馬上封侯事，相期在少年」，祝福對方能功成名就。

「封侯」是古代文人創作中常用到的名詞，比如漢代歌謡中有「曲如鉤，反封侯」，指品行不端功勞不夠的人反而能被封侯；唐代詩人王昌齡的詩文中有「忽見陌頭楊柳色，悔教夫婿覓封侯」的佳句；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更是用「封侯非我意，但願海波平」抒發愛國情懷。古往今來的文人墨客在詩詞歌賦中頻頻運用「封侯」意象，蓋因「侯」是僅次於「公」的爵位，是財富地位的象徵，是人生功業的外在顯化。

民間對猴馬組合的熱衷與文人筆下「馬上封侯」的冷淡，形成一種強烈反差。細思之下，或許是古代文人講究謙虛禮讓，雖常在詩文中提到「封侯」，表達自身渴望建功立業的心胸抱負。可封侯是結果，是文人實現救國安邦、經世濟民的理想後，朝廷給予的嘉獎，不是一開始便訂下的人生目標。如果文人在作品中直接提到「馬上封侯」，會顯得過於庸俗，似乎其人生就是為了錦衣玉食、富貴榮華。這種強烈的功利性會遭到他人的質疑與敵視，從此舉步維艱，離人生目標越來越遠。民間百姓沒有此種顧慮，多能直白地追求功名利祿、多子多福。因此造成社會上猴馬組合繁多，廣泛應用於各類行業。



▲馬上封侯鼻煙壺出自《精美的微雕藝術：玉石鼻煙壺》。

馬與猴生活環境迥異，咋被聯繫在一起？

馬具有很強的適應性，能在草原、平原、山脈等各種環境下繁衍生長，然而其理想的棲息地當屬草原，蓋因廣闊開放的空間給予馬群生存的食物與奔跑的場地。猴子的棲息地也多種多樣，有熱帶雨林、高原、山地等，其理想的生活區域當屬能提供充足食物與安全的森林。

猴與馬生存環境不同，生活習性也相差甚遠，其組合母題歷史卻頗為漫長。成都博物館收藏的漢代「機織·釀酒·馬廄·蘭鵠圖」畫像磚，其中拴馬石柱上懸繫著一隻猴子，姿態輕盈，神情活潑。

內蒙古地區出土過一批「青銅騎馬造像」，馬背上的騎士形似猴子，據學者考證其估計是西周或春秋時期的文物。和田約特幹出土的猴子騎馬俑具有鮮明的內蒙古「猴子騎馬造像」特點，據學者考證其年代估計為漢代，可能是漢民族與草原民族文化交融的產物。故而猴馬組合歷史久遠，傳播範圍寬廣。

文獻中也多有將猴與馬綁定的記載，比如北魏學者賈思勰在《齊民要術》中提到，「常系獮猴於馬坊」；南宋文人洪邁在《夷堅誌·孟廣威獮猴》中提到，「常畜獮猴於外廄」。可見將猴子與馬混居，是當時一種較為普遍的做法。

兩種生活環境迥異的動物，為何被人聯繫在一起？蓋因傳說猴子可以避馬瘧，明代醫學家李時珍在《本草綱目·獮猴》中提到，「養馬者廢中畜之，能辟馬病。胡俗稱馬留雲，梵書謂之摩斯吒」，該條記載背後意味深遠。古代泛稱中國北方和西方的少數民族為「胡」，「胡俗」二字表明猴子能避馬瘧的說法可能源自北方草原民族，之後流傳到漢人聚集地。此種構想也頗為符合猴馬文物時間順序，先有西周或春秋時期的內蒙古「青銅騎馬造像」，後有漢代畫像石中的猴拴馬柱，似乎猴馬傳說從北方草原傳到了西南山地。

「梵書」二字則表明，猴能治馬瘧的說法與佛教有關。猴子在佛教故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，有學者認為孫悟空的原型是印度神

猴哈奴曼。恰好《西遊記》中孫悟空曾在御馬監中擔任「弼馬溫」，負責養馬，之後又護送唐僧前往西天取經。有趣的是，書中天馬見了孫悟空都「泯耳攢蹄」，表現得頗為親暱乖巧，很短時間內就養得肉肥膘滿，成為上佳駒馬。這些內容無不是在展現猴子真能有益馬的成長。

猴子為何能治癒馬瘧？李時珍在《本草綱目》中引用《馬經》的記載道，「逐月有天癸流草上，馬食之，永無疾病矣」，「天癸」亦即女性月經所流之血，母猴的月經流到草料上，馬吃了這些草料後就不會得病。無怪乎孫悟空最後大鬧天宮，蓋此前弼馬溫一職太過辱候，也難怪取經路上有妖怪提到弼馬溫時，悟空多半會非常憤怒，舉起金箍棒劈頭打去。

清人陳淏子的《花鏡》一書中有猴子治馬病的記載，「養馬者多畜之廄中，任其跳躍，可辟馬病」，「任其跳躍」四字揭示了猴治馬的深層原理，可能是覺得猴子生性活潑好動，拴入馬廄跳躍縱橫，馬在其中最初或許恐懼，時間長了就能習慣，而少有驚病了。

雖然上述方法顯得較為荒誕，也不怎麼科學，但猴子可以「避馬瘧」在草原民族、佛教等因素影響下，成為古人的一個常識，比如見多識廣遊歷各地的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在詩文中提到「獮猴看櫪馬」；宋初學者梅堯臣也延續過往經驗，吟誦「嘗聞養麒麟，辟惡系獮猴」的詩句。蘇軾卻發出反對之聲，其在觀摩宋代畫家李公麟的《沐猴馬圖》時，提筆言道：吾觀沐猴，以馬為戲。至使此馬，竊銜匏管。沐猴宜馬，真虛言爾。

蘇軾從畫像中發現猴子活潑好動，戲弄馬兒，導致對方吐出嚼子、咬斷韁繩的場景，產生猴不適合馬的感歎。李公麟的《沐猴馬圖》類似今日的寫真作品，反映現實中的猴馬關係，似在表明猴避馬瘧很不科學，也不實用。

現代科學研究並未證實猴子真的能避馬瘧。因猴能治馬瘧而形成的猴馬組合，以及「馬上封侯」一類的觀念，更多是種文化象徵，是古人的美好祈願。

對稱作用下的猴馬神性

民間與文獻中有關「馬上封侯」「猴避馬溫」等概念的描繪與記載的背後是對猴子的神化，通過信仰、想像等方式，賦予其神性。

猴子的神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。新石器時代，諸多猴類文物，比如重慶大溪遺址出土的母子猴玉雕，造型逼真，估計為日常欣賞品，基本可以確定與神性無關。

新石器時期的猴子是否有神性，如今已經難以確定。但是至少可以確認到了春秋時期，這種神性基本喪失，有傳世文獻為證。比如《莊子》記載吳王曾浮江射猴，被對方躲開；《列子》記載養猴人以果子飼養猴子，採用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的方式愚弄它們。上述文獻只提到猴子的自然屬性。

到了戰國時期，考古文物中發現猴子開始被神化，其背後是原始薩滿教信仰中的世界樹崇拜。比如戰國中山王豐墓出土的十五連盞銅燈，被學者考證為「世界樹」，用來充當溝通天地與人類的橋樑。猴子與鳥獸附著在樹上，順帶著具備神性。《山海經》等先秦典籍中記載了許多具有神性的樹木與飛鳥，比如湯谷有扶桑木，十日化身為鳥，棲息在樹上。同理，攀爬在連盞燈上的猴子也應該被賦予神性。

與猴子相反，馬的神化過程中世界樹並未起到關鍵作用。早在商代時期，商人就有崇拜神化馬的習俗，比如甲骨文中「馬」字有一個突出的眼睛符號，象徵著太陽。而太陽崇拜是商人祖先崇拜的重要組成部分，故此馬在商人的文化觀念中便具備著神性。該理念深刻影響著後人對馬的態度，比如反應先秦禮儀制度的著作《周禮》中記載：春祭馬祖，執駒；夏祭先牧，頒馬，攻特；秋祭馬社，臧僕；冬祭馬步，獻馬講駟夫。

周人在商的基礎上，更進一步，春天要祭祀馬的祖先，夏天祭祀最初養馬的先賢，秋天祭祀最初乘騎馬的先賢，冬天祭祀馬害

之神，祈求馬能平安順利地生長。

《周禮》文獻屬性較為複雜，對於馬的祭祀可能過於理想化，而戰國早期曾侯乙墓中出土衣箱上的二十字漆書，「民祀唯房，日辰於維，興歲之駟，所尚若陳，琴瑟常和」，駟是古代同駕一輛車的四匹馬，則表明戰國及其以前確有專門祭祀馬的活動。

在猴馬組合中，將沒神性的猴與有神性的馬，聯繫在一起的關鍵性要素乃是世界樹。它通過「對稱」，採用「動物—樹木—動物」的組合，體現自身位居世界中心，表明自己的身份，屬於西亞地區新石器時代世界樹的典型手法。在這種對稱概念引導下，猴馬組合被捆綁，並簡化成「猴子騎馬」的母題。比如漢代居延肩水金關遺址出土木版畫，畫面中猴多，馬少，兩者數量不成比例，且皆在樹的右側，估計是作者受篇幅限制，畫了原圖的一半。居延處於西北草原與西南山區的交接地帶，恰好能將猴馬兩種生活習性不同的動物集中在一起，通過實踐形成猴馬組合。隨著時間的流逝，世界樹的作用會慢慢淡化，對稱的原則也會逐漸模糊，只保留下猴馬的動物組合。猴馬組合的「神性」解釋了避馬瘧的原因。蓋猴子具有神性，與之組合的馬能百病不生。加之「猴」與「侯」諧音，猴馬組合生成的「馬上封侯」符合人性追求，化作吉祥圖樣，融入傳統文化。

一個簡單的馬上封侯圖樣，勾連著草原與森林，融合了農耕與遊牧兩大文明的元素。往前追溯更是能窺見先民的宇宙觀念，瞭解世界樹對中華神話體系的影響，以及其對稱原理令動物產生神性。在此環境下，猴馬兩種截然不同的動物形成組合，受到民衆認可，甚至成為蘇州匠人手中經常出現的素材。

作者 / 吳甘浦
本版圖文均據「蘇州吳文化博物館」微信公眾號